

中国有根深蒂固的旅游文化。踏遍山山水水的古代士人,因经世致用的思想驱使,主观上绝非为旅行而旅行;不过就其客观效果而言,确实丰厚了、丰富了、丰盈了旅游文化。

古代旅行家与旅游文化的养成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伍立杨

古人足迹中的经世致用思想

古人的旅行,那种远涉边关,问鼎绝塞,踏遍青山的事功与心情,常有今人所难以想象的地方。

汉代张骞,以使节身份出使西域,两次启程前往遥远的西域,今人难以想象的广大地区,对丝绸之路的开拓贡献极巨。他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、葡萄、苜蓿、石榴、胡桃、胡麻等等,完成了探索中亚的史诗般的功业。他从伊犁河流域,折向西南,进入焉耆,再溯塔里木河西行,过库车、疏勒等地,翻越葱岭,直达大宛……又沿塔里木盆地南部,自莎车,经于阗、若羌,进入羌人地区。他的脚步,走出了誉满全球的丝绸之路;他的努力,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东西。他还派出几支队伍,前往大西南——原西南省南部及今昆明以西的广大地区,以求打破西南同中原的隔绝状态。

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,以地理巨著《水经注》名世。突破了《水经》只记河流的局限。他以河流为纲,详述支、干流区域的地理,包括山脉、土地、物产、城市的位置和沿革、村落的兴衰、水利工程、历史遗迹等情形……如此分量超重的地理巨著,在当时的中国,以至世界上都罕有其匹。酈道元在少年时代就已游遍山东,以后又到过许多地方,每到一处,都要游览当地名胜古迹,留心勘察水流地势,探溯源头。

唐代高僧玄奘,即声名赫赫的唐三藏法师,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,他就是《西游记》中心人物唐僧原型。他于贞观初年西行,孤身涉险,历经千磨万折,抵达天竺北境,复经中亚地区、阿富汗而进入印度境内,沿途瞻礼圣迹,迤迤南行,贞观十七年,才动身东归。经由今之新疆省南路、于阗、楼兰等遥远路途,往返共历十七年,行程五万里。

晚明徐霞客为了系统观察大自然,获取有关中国地理直接的第一手的资料,明确了“探江河发源、寻三大龙脉”为目标的匡时济世之途,走上了实证科学的坚实道路。徐霞客的足迹遍及今中国16个省、市、自治区。他不畏艰险,曾多次遇盗,数度绝粮,仍毅然向前,终于成就一代地理名著。

同为明代人的卓越药物学家李时珍,历时卅载,跋涉山川丛林,采集草药标本,寻访民间验方,编纂完成近两百万字之巨的药学专著《本草纲目》。李时珍遍访名医宿儒,搜求民间验方,收集药物标本,多次外出,“远穷僻壤之产,险探山麓之华”,前往今东南、两广大量地方及名山访问,搜求。

近代学者丁文江在民国初年始入云南境内,开展矿洞调查,路线则大体沿着徐霞客在云南的足迹重复一遍,进行实地考察,“他带领学生登山必到峰顶,移动必须步行。每人一手拿锥打石,一手用指南针与倾斜仪以定方向,测角度。自行测量地形及绘制地图”(翁文灏语)。就是经由这种严格的训练,中国地质界的诸多人才方能脱颖而出。

……

对于古代杰出的学者或士人,旅行本身只是一种副产品。张骞出使西域,乃出于社会政治文化的需要,社会意义分量超重,绝非休闲或隐逸可以概括。徐霞客受到当时东林党人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,不贵空谈而贵实行,才催生了他的万里经行。读万卷书,是吸收前人经验和思想;行万里路,则是要多游历汲取实际经验以印证扩展前人思想。

顾炎武则强调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这是士人的基础功课,即学问绝非书斋里的皓首穷经,而是必须有益于国事。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,讲求经世致用,知行合一,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,面对社会矛盾,并用所学运用于社会,以求实效。这一思想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求实、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,系经世致用思想在地理方面的实践。顾炎武的名著《日知录》若无地理亲身经验的垫底,那简直无法想象。他编成的地理名著《肇域志》,兼有保存地理资料与启发思维的重要价值。司马迁的旅行是为著述打基础,徐霞客的著述,初衷并非为文学贡献文本,结果无心插柳,成就一代旅行文学不可逾越的高峰。

马可·波罗的万里长征

今人视徐霞客等先贤为职业旅行家的诞生,其实在前人的本意仍然是为了探索气象万千的大自然。因写此文,笔者仔细考量职业旅行家一词的含义,颇觉难以找到恰切的人选。盖如司马迁、酈道元、李时珍、徐霞客……以及近现代的丁文江、傅增湘等等古圣今贤,他们的出发点和兴趣聚焦点,都在于经世致用,可能和职业旅行颇有距离,反复思量,只有一个人——还是外国人,近于职业旅行家的概念。他就是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的作者:出生在威尼斯、籍贯在克罗地亚的马可·波罗。

马可·波罗在十三世纪下半叶开始其漫长的东方之旅。他先至以色列,再穿过叙利亚、伊朗、阿富汗,翻阅帕米尔高原,经由喀什,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行走,一路经过和田、敦煌、张掖、宁夏,于1275年夏抵达元行宫上都(今内蒙古多伦西北),见到了元顺帝忽必烈。

张骞通西域行程图



旅行改变世界·文化



《徐霞客坐听鸣弦泉》 (范曾作)

马可·波罗悟性明敏,随即掌握了东方朝廷礼仪,学会蒙古语。忽必烈对他甚看重,除在京城大都应差外,还数度派他到各地及周边邻国访问游览。马可·波罗出访过云南,又沿大运河遍访江南,到过淮安、宝应、高邮、泰州、扬州、南京、苏州、杭州、福州、泉州……其间在扬州还出任地方官。此外,他还以使节身份访问过东南亚一些国家,如印尼、菲律宾、缅甸、越南等国。

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前言写道:“从上帝创造亚当到现在,从没有人,无论是基督徒、异教徒、鞑靼人、印度人或任何种族人,像马可·波罗那样到过世界那么多地方观察和探险,知道那么多的奇风异俗。”

马可·波罗的万里长征,打开了欧洲的地理和心灵视野,掀起了持久的东方热,欧洲人由此生发成长盛不衰的东方情结。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,学习东方,以致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。

文学游记与旅游文化

踏遍山山水水的古代士人,因经世致用的思想驱使,主观上绝非职业旅行,或者为旅行而旅行——类似后世的为艺术而艺术;不过就其客观效果而言,确实丰厚了、丰富了、丰盈了旅游文化。

历代隐士以及他们的山居生涯,也大大丰富了旅游内涵,较为接近今天的旅游文化。他们的生活方式,是为了从烦嚣的氛围中暂时超脱出来,向大自然亲近,藉以恢复身心的疲困。

作为纯文学的游记在文化史上出现得较晚。

先秦至两汉的史著、政论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等,也是伟大的散文作品,但是这时期并无游记散文的概念。虽然《山海经》甚至《论语》里面偶有灵妙的写景、及地理小品文字,但尚属吉光片羽。魏晋以后,门阀统治巩固,名士悠游岁月,纵情山水,开始出现专业的游记作品。往后,即使纯文学除外,即使在《水经注》这样的地理著述中,也是记述文采焕然,文笔优美,令人读之不忍释卷。总之,自魏晋以降,唐、宋山水游记各有寄托,技巧圆熟,感慨深远,即以唐宋八大家而言,出现诸多传诵千古的名篇。明代商品经济活跃,市民意识萌生,不单出现人与山水浑融一体的山人文学,其不少作者,还以广游名山大川的旅行家面目出现,他们各自不同的艺术手段如诗歌、散文、绘画为山水写真,兼有鉴赏大自然的文艺批评家的身份,可以说,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山水知己。至晚明时节,山水小品佳作迭出,这个时期的《徐霞客游记》,不但在地理科学上有诸多突破,就以文采而言,也是当仁不让的第一流的文学作品。

使节的出访、学者的考察、文人的游志、专家的搜求,广义上都属于人文地理的范畴。近年来,人文地理呈现一派复兴景象,作为一种内在核心资源,实为旅游文化增添了无量生机。中国古代不论是杰出的地理专著,还是优秀的山水游记,其创作乐曲同样源远流长,文学本来就是文化范畴最具活力的一种形式。而游记、地理、山水类文字,承载着极为珍贵的文学遗产和精神财富,它转而又化作文化中的活性成分,诚可谓旅游文化的精髓,即以最表象的意义而言,足以使后人卧游祖国山水,怀想历史往事,了解风土人情,欣赏文字艺术,受到爱国熏陶……进而激起旅游者的兴趣,踏着古人的足迹,深入大自然的怀抱,今天旅游事业长盛不衰,和中国根深蒂固的旅游文化,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

《大唐西域记》是唐代高僧玄奘的历史地理著作